

教育

曼努埃爾·特謝拉神父 與澳門教育史

António Aresta *

對所有想研究葡萄牙在澳門特別是遠東存在歷史的人來說，曼努埃爾·特謝拉先生的這部真正堪稱不朽的著作¹是不可或缺的指南。

為拯救有嚴重失傳危險的文獻原件——其中保留至今的一些文獻已不是原件，經過曼努埃爾·特謝拉幾十年如一日勤勉和耐心的工作，一座氣勢宏偉多姿的歷史編纂學大廈終於建造起來了，它可以作為研究歷史、宗教和文化中最具爭議及疑難問題的起點。

在《澳門歷史》中的每一章節，人們都幾乎不難尋覓曼努埃爾·特謝拉勤勉耕耘的身影。他收集資料，將翔實的史料加以歸納，揣摩英雄史詩般的情感和事件，或記錄下對那一時期印象頗深的事情和感覺。總之，《澳門歷史》堪稱一部當代的百科全書，無論如何讚譽它都不為過。

然而，人們會很自然地問，一個年輕人究竟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從葡萄牙東北部山區遠涉重洋來到澳門的呢？我們還是引用這位青年人自己的話來回答吧：“在1924年10月27日，星期一，我乘坐蘇泰號汽船從香港來到澳門。我們同行的是五位少年，均來自菲雷索：愛德華多·奧古斯托·馬薩，13歲；安東尼奧·曼努埃爾·佩雷斯，15歲；弗朗西斯科·馬蒂拉，12歲；曼努埃爾·特謝拉，12歲；曼努埃爾·馬里婭·瓦里茲，14歲。除了最後一位沒學完五年級課程外，其他人都念完了小學的全部課程。從里斯本到香港這一段路程，我們乘坐的是達爾戈南的郵輪。這一段路同行的有：若澤·安東尼奧·奧古斯多·蒙特羅教師；馬德烏斯·德利馬工程師，他們二位均已辭世了。還有葯劑師唐納·索菲婭·阿格萊布，如今她還生活在波爾圖”²。

傳統上，布拉岡薩及其主教轄區為殖民地，特別是遠東地區輸送了不少有志獻身於神職的青年。上面提到的那幾位，都去了聖若澤神學院。

* 教師（教育暨青年司）和研究員

1. 參見附錄中曼努埃爾·特謝拉履歷及其作品注釋。

2. 參見曼努埃爾·特謝拉1924-1933年所著《惡劣天氣下的神學》，該文載於《澳門主教區轄區教會》第791-792期公報，1970年7-8月合訂本58卷第598頁。

在完全陌生的環境裏生活，這些遠離家人和親戚的年輕人需要經歷一個重新適應的艱難過程。不久，他們便投入到學習中，這對他們日後履行神職是有益的。然而，應該說他們心理上受到的震撼是很深的。時光流逝了63年之後，曼努埃爾·特謝拉仍能重新回憶起童年的經歷。他當時的感受是：“我在菲雷索·德埃斯巴達·阿辛達上小學時，冬天異常寒冷，課間休息時，我們這些學生不得不到附近壓榨廠車間的大火爐烤手。當時學校既沒有取暖爐，也沒有空調。當然，我更無從知曉70年後的今天那裏是否還是老樣子”³。

“離學校大概半小時路程的地方有幾個小湖，冬天都結了冰。放學後我們就到那裏。你知道為什麼嗎？僅僅是想在冰面上跑跑或者說是不穿冰鞋滑冰。對將要發生的危險，我們連想都沒想過。假如冰裂了，我們都會掉進湖底，也就永遠回不來了，一切都將結束。可是你知道嗎？不僅僅是在冬天，而且包括每一個季節以及全年的每一天，我們是怎麼生活的。我們在冰面上行走，是行走嗎？我說得不確切，應該說是瘋一般地溜冰，與其說是在湖面上，不如說是在河面上。一旦冰層斷裂，我們就會掉進去。這將是致命的落水，墮落進無底的深淵和一望無際的沙灘。我們往神秘的那邊走去時最好停一會兒，並想想我們在去面見最高法官前是否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是去邀功還是去請罪？”

聖若澤神學院即聖若澤皇家神學院，始建於1728年2月23日，具有悠久和神話般的歷史，被視為一所精英薈萃的學堂，其校園規模和聖保羅學院相似。此外，教會的出現為政治力量行使主權提供精神依托，這使雙方均受益並由此產生了文明思想。這點在教育家們的政治、道德、基督教會報告中深深地得以體現。

當時的神學院給曼努埃爾·特謝拉留下的印象是這樣的：“1924年，當我來到神學院時，見到以下幾位教師：院長弗朗西斯科·博尼多·布拉岡薩神父；教導主任勞爾·加馬索；神學院學科主任若澤·安東尼奧·蒙特羅；神院校監納爾西索·阿麥利科·德甘波斯；音樂教師費爾迪南多·馬貝利尼；神學和拉丁文教師若昂·達科斯塔；神學教師安東尼奧·若澤·戈麥斯；哲學和葡語教師雅伊梅·里貝羅·馬丁斯；自然科學和數學教師若昂·克里馬科·杜羅薩里奧；總管和小學教師安東尼奧·巴雷多，第二年，原在香港教葡語的安東尼奧·達斯內維斯老師接替了他；葡語老師奧拉西歐·佩雷拉·達席爾瓦；法語老師雷吉斯·熱爾華斯和小學教師曼努埃爾·若阿金·平塔多……”⁴“在同一幢樓裏，寄宿着兩個年級的學生。他們的專業沒有一點聯繫，且截然不同——神學院學生和中學生。寄宿生中有些是靠慈善院提供資助。這一年，中學生不足百人，神學院却有數百名學生。神學院成了當時收費高的學府，無論是學費、體育等所有方面，其費用都是最高的”⁵。

儘管富有想象力的年輕人敢於衝破某些教條的束縛，但由於與外界隔絕以及校規森嚴，他們與外界及喧嘩的都市接觸甚少。不過這也無可指責。

曼努埃爾·特謝拉的回憶都集中在教師群體上。對某些教師的言行還做了詳盡的描述：“雷吉斯·熱爾華斯老師於1916年離開巴黎海外傳教團，並在澳門主教轄區受到唐·若昂·保烏利諾主教的接見。雷吉斯老師性格怪誕，他具有很高的文

3. 參見1987年11月23日的《澳門報》。

4. 同上，參見第583頁。

5. 同上，參見第591頁。

學造詣，在神學院教授法語和希臘語。他是一位練達的文學家、詩人，也是當時澳門最著名的歷史學家”。1925年他去了北京，在這個城市的非宗教大學講授法語。熱爾華斯老師從不批改學生的聽寫和作業，只是叫一個學生來到黑板前，把作業抄在黑板上。老師讓這個學生把錯的地方逐一改正，其他的學生也跟着改正各自的錯誤。他講葡語時帶法語語調，常引起哄堂大笑。一個極小的失誤，都會成為笑柄。“有一次，他對一位學生說‘七月的’（譯者注：葡文中七月的‘de Julhos’與跪下‘de joelhos’發音相近），於是，那位學生就雙膝跪地走向老師的講台。由於他幾乎全是用法語講課，我們的法語也學得很好……”⁶ “若昂·克里馬科·杜羅薩里奧個性不突出，他天資聰穎，心腸好，平易近人，且樂善好施。當教師，他不太適合。他上課時，總是翻來覆去地講一些日常生活中平淡無奇的瑣事：我起床無規律，做彌撒無鐘點，吃早餐無時無候，等等。一天，上朗讀課，他準備了一首詩，在課堂上先朗讀了一遍，然後讓我們發表意見，並讓我們對不喜歡的地方進行修改。輪到我發表意見時，我說這首詩寫得相當完美，以至於沒有再做修改的必要，再說我這輩子也寫不出這麼好的詩來。不過，學生中亦不乏詩人，他們建議對詩中的某些句子或用詞做些修改。老師不僅接受了這些建議，而且還將改過的詩念了一遍。幾個月後，人們發現一個秘密。有人在一本書上發現了這首詩，其作者是若昂·德萊莫斯。在同學的哄笑聲中，那些一心想做詩仙的人，非常難堪，羞愧難當……”⁷。這些回憶使我們清晰地看到，在一個徹頭徹尾地保守，教條重重乃至事無巨細的神學機構中，知識傳播會給大腦留下長久的記憶。在人們的交往中，特別是在有教學關係的師生間，絕不可以輕易地說對方愚笨。尤其是對一個可能要步入神職職業門坎的學生不能這樣講，這位學生一生中將會為成為一名神職人員而規範自己的言行。

曼努埃爾·特謝拉為我們舉了另一個值得深思的例子。“在神學院一次考試中，因為若昂·達科斯塔老師取笑學生而被耶穌會解僱了。他曾是神學院教權主任並兼任神學與拉丁語教員。作為一個優秀的拉丁語學家，他強迫學生學習。如果某個學生反對他，並以《薩拉伊瓦拉丁語——葡萄牙語大字典》中有不同解釋為由向他提出質疑時，他便會向該學生怒吼：滾回你薩拉伊瓦老家去吧！他在課堂上講的尖酸話語令人毛骨悚然，連熟悉他的人亦感到難以忍受。如果將他教學的才幹比喻為魚鈎，將同情心比做魚餌的話，魚餌總是脫鈎。正因為如此，當離開神學院回到大都市後，他並不覺得昔日有何值得懷念的地方……”。應若澤·達科斯塔·努內斯主教先生之邀，費爾迪南多·馬貝里尼老師從意大利來到神學院，教音樂並任該院樂隊的指揮。他是位才華橫溢的大師，培養出一些優秀的音樂家。他譜寫出的樂章，有不少流傳至今。這些作品包括卡蒙斯的十四行詩《我優雅的心靈》。當時在澳門有兩位意大利音樂大師，他和愛利塞歐·古阿爾迪，後者是一個合唱團的指揮。有一天下午二、三點鐘時，他們在新聞記者在場的情況下大打出手，扭作一團。因此，我們評論說，哪裏有兩個意大利人，那裏就有台好戲。就在合同期滿的當天，馬貝里尼老師十分難過地離開了神學院。在告別時，他稱自己是冤枉的，並發誓說自己是清白的……⁸

6. 同上，參見第586頁。

7. 同上，參見第585 - 586頁。

8. 同上，參見598頁。

在談及幾位研究神學的同學時，曼努埃爾·特謝拉的風格和其同胞特林達德·古埃略⁹尤其跟恩·馬德烏斯不同。安東尼奧·德索薩是聖·馬德烏斯人，當過兵，進神學院時已經21歲了。即使他學習再努力，掌握的東西也少得可憐。

“你不學習嗎，索薩？”老師兼神父雅伊梅·利貝伊羅·馬爾丁斯問他。

“學習呀，神父先生。不過，等我一上床，第二天醒來後，我的腦子裏就一片空白了！”

“噢喲，噢喲，”法語老師雷吉斯·熱爾華斯神父用他那糟糕透了的葡語感嘆道：“我親愛的索沙，你將會抓到一只狐狸的（譯注：葡語轉意為你將及不了格）”¹⁰。這個可憐的“索沙”因總不及格，連續三年留級。1924年當我來到神學院時，他還在念一年級的法語，我們竟成了法語班的同學。後來他離開了神學院，我想也許他是因為永遠不能升入法語二年級的緣故。一天，熱爾華斯神父翻譯了捉鱈魚一書的有關章節。

“成千上萬條的鱈魚……”——他噙道。

索薩及時給他糾正發言，他反駁道：

“我親愛的，索沙，你只會講葡語，可你的法語却及不了格。”

當然，人們不能忘記提及這兩個英雄人物：“安東尼奧·曼努埃爾·皮雷斯，係安東尼奧·瑪麗婭·皮雷斯和弗朗科·蒙特羅之子，於1933年被委任為祭司，以後不久便赴東帝汶履任。他不修邊幅，鬍子長長，儼然像一個老主教。在一所學校前，他安了家，並建了一個樣板農場。他教學生耕地，農場的收成可全部滿足學校的需要。神學院主教唐·若澤·達科斯塔·努內斯在一份上呈海外部的報告中高度讚揚了他，並決定向其提供進修農業管理課程的獎學金，以便使其改進耕種方法。戰爭毀滅了這些計劃，並斷送了這位年輕傳教士的生命。”

日本人指責皮雷斯神父為澳大利亞士兵提供糧食和烟草。神父向來是條硬漢子，他回答說，葡萄牙是中立國，只要喜歡，她可以向任何人，不管是日本人還是澳大利亞人提供糧食。這就足以使他和同伴諾爾貝托·達奧列維拉·巴羅斯喪命。日本人刺死了他們，還往屍體上澆汽油、焚屍。……弗朗西斯科·馬德拉是若澤·弗朗西斯科·馬德拉和若澤芬娜·阿麥麗亞·文杜拉之子，於1934年10月27日被任命為神父，同年到東帝汶赴任，他懷着滿腔的熱忱在那裏工作了八年。他是五個同伴中最膽小的一個，我們從菲雷索來的路上，必須得騎馬涉過一條小溪，大家都過來了，僅剩下他一人站在對岸，他怕水，不敢動，急得哭了起來，我們只好返回去把他接過來。

“雖然這位年輕人相當膽小，但是，從日本人一入侵東帝汶，他就改變了性格。他穿上澳大利亞士兵制服，束上子彈夾，扛起槍，深入叢林作戰。由於食品不足，腿和腳都潰爛了，不久他便去世了”¹¹。

9. 特林達德·科埃略（1861–1908），後山省莫加多羅人，他的代表作是：《我的戀愛》（1891）和《葡萄牙公民的政治手冊》（1906）。

10. 同上，見595頁。

11. 同上，見599–600頁。

以上簡單地記述了1924至1933年間曼努埃爾·特謝拉所受教育、所處環境以及對他產生較大影響的事件等。看來，粗綫條地描述一下同一時期澳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有趣的。

儘管我手頭的資料相當充足，但也許是更多受了充斥新聞界評論的影響，我才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即澳門是座緩慢發展的城市，中國遭受內戰蹂躪的消極因素制約了這座城市的發展。

按照殖民部1917年頒佈的法令，“依據1887年3月26日與中國簽署的條約，澳門省包括澳門本土及其邊緣領土；省政府駐地為澳門市”¹²。

在建這座基督城時，兩個平行的運動和兩種實踐哲學均主張加強葡萄牙在該地區的存在。一方面，是要搞城市基礎設施工程，比如由卡斯特洛·布朗科工程師負責的供水和內港改建等工程絕不可不建。另一方面，是要加強愛國主義價值觀，並將其在中國社會傳播之。例如，為薩爾明多·德貝雷斯、布里多·德巴依斯和安東尼奧·古維亞三位被奉若神明的飛行員舉行歡迎儀式，以及建立組織民眾每年朝拜卡蒙斯岩洞的機構。

曼努埃爾·特謝拉的心裏裝着這些愛國主義的壯舉。“60年前的烽烽火火和震撼人心的愛國主義令人難以忘懷。今天，愛國主義的火焰燒得不那麼旺了。過去，人們舉行紀念活動，悼念自始至終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在非洲、法國、在陸地和海上作戰，特別是在1917年4月9日的利茲戰役中陣亡的所有葡萄牙士兵。今天，人們又在舉行紀念活動，悼念4月25日（譯注：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持續了四十餘年的極右法西斯獨裁統治被推翻，開始民主化進程。）前在非洲犧牲的士兵。我參加過1926年4月9日政府舉行的盛大紀念活動，當時是阿爾梅達·馬伊亞·馬加良斯政府執政。阿爾梅達有個綽號“馬-馬”，因為他名字是二馬打頭。阿爾梅達的前任羅德里戈·羅德里格斯，人們更習慣稱呼他“羅-羅”。

這一年，紀念活動在大教堂舉行，澳門大主教若澤·達科塔·努內斯主持，演奏了《安魂彌撒曲》，神學院的複調合唱團伴唱。總督、大法官出席，同他們一起出席並坐在貴賓席上的還有陸軍和海軍軍官、皇家參議員、政府及各部門的官員。在場的軍人和市民非常多，佈道的是克里斯蒂亞達英雄史詩的作者、總祭司安東尼奧·若澤·戈麥斯博士，接着，祈禱《給我自由》。下午三點，在塔布·塞阿克卡伊沙學校的操場舉行閱兵儀式，由海軍、步兵、炮兵、遠征軍、陸地各海上警察及義勇軍700餘人組成儀仗隊。總督檢閱了儀仗隊並發表了充滿愛國主義激情的講話，接着大主教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全體默哀一分鐘後，人們把旗幟降下，紀念活動在鳴禮炮21響之後結束¹³。

但是，就城市的本身而言，我認為還是值得故地重遊，一是確實值得，二是連一個外國人，一位西班牙作家維森特·布拉斯科·伊瓦涅斯都為之動容：

12. 1917年11月5日第3520號令頒佈澳門省行政地圖。1926年10月2日第12421號令確立了葡萄牙殖民政府的組織基礎。1926年10月4日第12499號令頒佈了新的澳門殖民地行政地圖。

13. 見1987年4月8日的《澳門報》。

“澳門是多姿多彩和人口較少的遠東城市。同時，從城市的穩定堅固性中就可以知道城市的奠基人來自何方，大部分樓房都是磚石結構的，而不是像中國其他城市所見的木板樓。幾乎每幢樓的頂層都建有連拱廊或封閉的回廊，樓頂上建有天主教堂式的鐘樓。

澳門，起先人們稱之為聖人城，一個中國神仙的名字，後來逐漸被當地語的澳門所取代。如果忽然間這座城市被遷移到里斯本郊區，那時人們將會感到多麼的奇異。在訪問了中國沿海的主要城市之後，這裏的景象令人聯想起古老的葡萄牙，包括這座城市煥發出的濃郁氣息好似來自我們那一半球的家鄉……

澳門座落在酷似直布羅陀的半島上，不過她沒有那麼高的山巒。一條細小的地峽將她和古老的“帝國”（中國）連結在一起。英國人在四分之三個世紀前建成了香港，而澳門則先於英國人，建起了在整個海灣堪稱最好的港口。在這個半島上，城市人口逐漸增加到了8萬。對彈丸之地的小小殖民地來說，人口過於稠密，這是商業帶來的奇迹……

現任總督羅德里戈·羅德里格斯博士，在躋身政界前曾是葡萄牙極負盛名的醫生，一個與君主制進行頑強無畏鬥爭的共和黨派人士，勝利之後，他與其他反君主制鬥士一樣，放棄了從前的職業，為新葡萄牙共和國奔走效力。

在澳門停留的這段時間，我可以欣賞到我的朋友羅德里格斯在執政數年間創下的政績。完善的稅收及管理為建一個大噸位的港口提供了足夠的資金，這個碼頭可供大噸位遠洋貨輪停泊。澳門將會由目前僅能通過沿岸航行的帆船隊和走私船隻的平靜內河，變為一個設備齊全、裝卸作業繁忙的現代化港口。這個港口將會引來除英國人外的所有船隻，因為她比香港更靠近廣東。在總督幾位助手——他們都是素質高的年輕人——陪同下，我們遊覽了市容，到處呈現出中國式的樓房和葡萄牙17世紀風格的別墅珠聯璧合的風景……

最後我們參觀了對文學愛好痴迷的人來說最具意義的地方，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慕名來澳門。總督帶我們走進一所花園，那裏有個岩洞，卡蒙斯就在這個岩洞裏面冒着酷暑，夜以繼日地思索和寫作。澳門這地方可稱得上是熱帶，這所花園就像漸漸變舊的家俱那樣引人入勝，在花園豁亮的光綫和林木的襯托下，中國古典田園的沉悶與葡萄牙辛特拉花園的莊嚴相映生輝。我們看到一些官員的雕像，頭和手是瓷製成的，人身的其他部分是園丁用植物修剪造型而成。人們對詩人崇拜過度，詩人寵愛的隱居之處反倒被他們弄得丑陋、粗俗不堪。如今，這個岩洞僅成為大岩石中的一條通道，卡蒙斯的半身雕像就豎立其中。附近所有的岩石都被當做石碑；卡蒙斯所著偉大史詩《葡國魂》的詩句以及著名作家們歌頌卡蒙斯的詩篇被刻在上面。但如此之多的大理石紀念碑並沒有給此處增添什麼詩意——按理說此地稱得上富有詩意，反倒帶來了一種令人生厭的墓地氣氛。……我們又一次來到澳門的大街上，此時夜幕初至，街上呈現一派省會的氛圍。無數神職人員和着便裝的軍官、頭上頂着火槍手戴的大禮帽、身着白外套的英武的小伙子在悠閒地散步。羅德里格斯在其官邸以豐盛的晚宴款待我們，我很喜歡這所住宅和裏面的幾個大廳，這座官邸並不古老，但人們仍像喜愛古宅一樣讚賞她。家俱大都是從廣東運來的，每件家俱都有100多年的歷史，大廳四周擺放着中國古代人製作的色彩紛呈的大瓷花瓶。

羅德里格斯博士真心希望我們在澳門多走走、多看看，實不想讓我們在那天下午搭乘香港的汽船離去”¹⁴。

以上這此支離破碎和時光交錯的回憶，反映了一個具有事業心的人、一個已經成為創造歷史的人的主要經歷。還是讓我們繼續沿着他的足迹走吧。

曼努埃爾·特謝拉就讀時的聖若澤神學院是世俗神父（1910至1930年）和耶穌教神父（1930至1939年）領導的。其間換了幾任院長：若昂·馬查多·利馬（1921至1924年）；弗朗西斯科·博尼多·布拉岡薩（1924至1929年）；安東尼奧·巴雷托（1929至1930年）；安東尼奧·馬里亞·阿爾維斯（1930至1933年）和安東尼奧·恩里克斯·法爾多（1933至1935年）。

在澳門的教學，除家庭私塾外，均不會突破天主教會學校的模式，此外，政府僅實施擁護首相專制制度的政策，鑒此，於1762年驅逐了耶穌教徒，並承擔了教學以及解決與其相關難題的責任。第一位皇家教師若澤·多斯桑托斯·巴蒂斯特·利馬於1775年抵達澳門，並於當年建成第一所公立學校。

縱觀公共教育的整過歷程，從葡萄牙精神的文化範圍看，教育部門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¹⁵。

1914年，澳門政府公佈了《公共教育改革委員會的報告》¹⁶：

針對澳門公共教育的問題與現狀，我們需要採取最緊急的辦法和更徹底的措施。澳門正在非葡國化，並漸漸地遠離我們。她能夠而且理應在遠東成為葡萄牙文明的源頭，成為在競爭力十分激烈的中國和日本市場推銷葡國產品的中心，成為一名在上述各地強有力地宣傳“葡萄牙國家”的積極分子。但是，如果澳門的最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如果不從其本身的特點和實際出發制定出新的政策，澳門就不會而且將來也不會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在使澳門物質與精神進步和發展受益方面，澳門做得很少或什麼也沒做。在利用其地理條件民眾的勤勞與才智提高其殖民地的地位方面，澳門也做得很少或什麼也沒做。

澳門幾乎處於被拋棄的境地，顯而易見的落後面貌，糟糕透頂的公共教育等服務行業的現狀便是證明，澳門自身非葡國化的明顯事實便是證明。在澳門，人們講英語比講葡萄牙語更普遍，澳門的中產階級更熟悉莎士比亞的語言，而不是卡蒙斯的語言。

14. 維森特·布拉斯科·伊瓦涅斯（1867 - 1928），西班牙作家和政治家，共和主義者和反教會派人。1923 - 1924年曾在澳門逗留過。

15. 參見曼努埃爾·達席爾瓦·門德斯所著的《澳門公共教育》一書注；序言和結構為安東尼奧·阿雷斯塔所作，教育暨青年司，1996年；澳門教育歷史文件的第一和第二卷的結構、引言和注解為阿爾比諾·多斯·桑托斯·席爾瓦、安東尼奧·阿雷斯塔和奧雷利亞諾·巴拉塔所著，教育暨青年司，1996和1997年。

16. 見澳門教育歷史文件的第一卷75至76頁的阿爾比諾·多斯·桑托斯·席爾瓦、安東尼奧·阿雷斯塔和奧雷利亞諾·巴拉塔的结构、引言和注解，教育暨青年司，1996年。

聽說澳門的兒童在當地的私立商業學校就讀一、二年後，便能毫不困難和準確地應用英文，同時他們將小學裏所學的本來就少得可憐的葡語差不多全忘光了，這使我們這些葡萄牙人非常傷心。

聽到澳門人的家庭見到從上海或香港歸來的兒女時，都講英語，因為兒女們用英文會話和書寫能力比用本地方言更強，這使我們這些葡萄牙人十分傷心。

信息和文件殘缺和遺失的現象如此之嚴重，使人們不難理解，在澳門不存在一部教育史，更不用說某些領域的專題論文或學校的統計資料了。

如果我們不知道曼努埃爾·特謝拉的著作質量上乘，或進一步說，如果我們沒看到教師自身經歷寫回憶錄的人實屬鳳毛麟角，那麼曼努埃爾·特謝拉對《澳門教育史》所做的特殊貢獻就會大大地被貶低了。這樣做貢獻的人並不多，但其為人和人品却永遠堪稱典範¹⁷。

每天傍晚我都穿過大橋沿着氹仔散步，每天只不過走15公里。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有些人看我走得飛快，就學我，並想超過我。當超不過時，他們就開始跑起來。但不久他們就累了，於是停下來，再度落在後面，因為一見到他們緊跟，我也隨即加快了腳步，能夠和我鏢到底的人還真不多。

——吹牛皮！——讀者一定會說。

並不是吹牛皮。我只是想從中悟出一個訓戒：即對挑戰的訓戒。

在比賽中，誰都想奪魁，沒有一個人不想超過其他人。馬拉松、競走、選美、烹調、文學、建築、繪畫、奧林匹克運動等之所以要舉行比賽就是這個道理。

50年前，我在神學院和學教授拉丁文。當時，我喜歡用這種辦法：我鼓勵學生接受挑戰。我讓兩位同學就名詞和形容詞詞尾變化以及動詞變位一問一答，誰答對的多，自然誰的得分就高。已經過去50年了，至今我仍還能記起這種鬥雞般的爭鬥。

在此僅舉一個例子：“我有兩個非常聰明的學生，一位是曼努埃爾·達科斯塔·努內斯，他已經去世；另一位是若澤·布魯姆，他現在重病纏身。當布魯姆獲勝時，努內斯的臉上便會露出相當痛苦的表情，令人憐憫。他決意趕上去，為挫敗對方銳氣，他在學習中用盡了吃奶的力氣，其他所有的人也都有這股勁頭，於是在語言學習上進步很快。如果我們想取得成績，那就要敢於拚搏。在澳門，教育事業和教育史好像受到冷遇並被看成是次要的事情，因為編撰澳門歷史和葡萄牙在遠東存在的文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事實上，他提及的是《澳門的教育事業》¹⁸那本書。談到寫這本書的動機時，他特意做了如下的描述¹⁹：“有幾位中學和小學的校長來找我，要求我向其提供有關他們所在學校的組建過程及其歷史的情況。為滿足其要求，也是為告知後人，我用此勞動成果以饗讀者。這本書分為兩部分：1. 平民學校；2. 天主教會學校”

17. 見1987年10月29日的《澳門報》。

18. 該書於1982年由澳門教育暨文化司出版。見該書第433頁。

19. 同上，見該書序言。

這本書確實十分重要，不僅因為它開了先河，而且它從學校到學校、從校址到校址全面介紹了有關葡萄牙和澳門葡、中文教育史，它是一部歷史索引，它也成了有關資料的出處。

對以道德法規指引的主教轄區學校和教會教學法——其哲學定位並不明確——的教育作用，歷史編纂學者們給予了過高的褒獎。

澳門史書上將教育史注解為具有附屬性。曼努埃爾·特謝拉先生提出上述教育史具有顯著的和重要的地位。在當時看來特謝拉的這一評價是公正的，因為它涉及在中國出現了按葡萄牙本國哲理創立的學校組織，因為它涉及堅實地植根於中國土地和中國文明底蘊之中的葡萄牙文化的特徵。

正如安東尼奧·諾伏阿所談：《葡萄牙的教育史》將其着眼點主要放在“國家的範圍”上，如果不是將更廣義和更狹義範圍作為起點的話，似乎作者的思路會中斷。作者贊成關於現代國家的論點，葡萄牙教育史完成了給國家特徵下定義的重要使命。不過，今天這一定義有被《開放》雜誌中有關外國和本國國內其他社會和文化情況報導加以充實的趨勢²⁰。

現代歷史編纂學將以恰當的方式讚賞曼努埃爾·特謝拉先生所做的努力，他的著作是民族主義的和昇華的價值和行為與健康力量融合的結晶。

在這位英雄開拓者的指引下，我們需要走同樣的路。撰寫新教育史重要的是要有對多種文化的鑒賞力，看來，這一鑒賞力也許不會限制我們所做的和所將要得到的東西。

曼努埃爾·特謝拉神父履歷及其作品

曼努埃爾·特謝拉1912年4月15日生於葡萄牙東北部後山省菲雷索·德埃斯巴達·阿辛塔。父親安東尼奧·瑪麗婭·特謝拉，母親安娜·瑪麗婭·特謝拉。1924年10月27日，曼努埃爾·特謝拉來到澳門，就讀於神學院並完成神父學業。

他曾任葡萄牙在中國傳教團財產檢查官。1948至1962年在新加坡傳教。先後任教於聖若澤神學院、佩德羅·諾拉斯科商業學校、唐·恩里克王子國立中學。主持編輯澳門教區教會公報、澳門檔案和路易斯·德·卡蒙斯學院公報。

他是澳門東亞大學名譽博士，葡萄牙歷史研究院、里斯本地理協會、葡萄牙航海研究院、亞洲歷史學家國際學會會員。在他獲得的勳章中，突出的有殖民帝國勳章、唐·恩里克王子勳章、貴重獎章和基督勳章。曾兩次榮獲卡洛斯特·古本江基金會歷史獎。

20. 見安東尼奧·諾伏阿和若·路易斯·貝萊伊奧合著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教育史——考察與實踐》17至18頁——葡萄牙社會的教育科學；該書於1993年出版。

他的多部著作被譯成英語、漢語、日語和泰語。對他的一生和作品，人們多有研究，電視節目也時有播出。

他的作品有：《聖·洛倫索教堂》（1937）；《聖·洛倫索教區》（1937）；《菲律賓和國際聖體會》（1937）；《聖·拉法爾醫院》（1939）；《葡萄牙天主教在澳門的活動》（1940）；《卡蒙斯在澳門：對研究問題的貢獻》（1940）；《澳門及其島嶼》（1940）；《澳門主教區的主教和總督》（1940）；《塞卡爾男爵，安東尼奧·亞歷山德里諾·德梅洛》（1941）；《唐·若澤·達科斯塔·努內斯：履歷》（1941）；《尊敬的安東尼奧·瑪麗婭·阿力爾維斯神父，聖若澤神學院》（1941）；《安東尼奧·若阿金·巴斯托斯》（1942）；《十九世紀杰出澳門人的陳列館》（1942）；《佩德羅·諾拉斯科·達席爾瓦》（1942）；《聖周》（1943）；《唐·恩里克王子國立中學：五十周年紀念1894-1944》；《澳門的宗教等級和團體》（1956）；《葡萄牙傳教團——葡萄牙在新加坡傳教》（1956）；《歷史性朝聖：一次訪日印象》（1956）；《馬拉加葡萄牙教區》（1957）；《維森特·尼古拉·德梅斯基塔》（1958）；《瑪麗婭·德莫拉：五幕歷史劇》（1959）；《博卡洛斯》（1961）；《迪奧戈·書洛索及葡萄牙後裔在柬埔寨的英雄史》（1961）；《馬拉卡，二卷》（1961）；《新加坡》（1963）；《馬拉卡宗教日誌》（1963）；《馬拉卡早期的多米尼加人（1511-1636）》，（1963）；《耶穌會教徒在越南》（1964）；《耶穌會在澳門四百周年紀念》（1964）；《葡萄牙和西班牙與婆羅洲的早期接觸》（1964）；《路易斯·德阿爾梅達，聖若澤神學院：外科醫生、商人和傳教士在日本》（1964）；《羅薩里奧的聖母教友會和聖·多米尼加教堂》（1965）；《葡萄牙遠東日報》（1965）；《澳門人》（1965）；《經過澳門的殉難者》（1965）；《本約斯基伯爵在澳門》（1966）；《米格爾·德阿里加》（1966）；《莫里克·本約斯基伯爵：漂流到亞洲的匈牙利人》（1966）；《澳門教區的神父》（1967）；《澳門的醫生》（1967）；《皇家參議院的締造者》（1968）；《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澳門女性的服飾》（1969）；《唐·恩里克國立中學：七十五周年紀念：1894-1969》，（1969）；《在澳門的瑪麗亞宗教信仰》（1969）；《唐·梅爾基奧爾·卡爾內羅：澳門仁慈堂的創立者》（1969）；《路易斯·達阿爾梅達，聖若澤神學院：醫生，商人和傳教士》（1970）；《澳門的警察》（1970）；《唐·佩德羅五世劇院》（1970）；《澳門教區的神父》（1972）；《皇家參議院》（1974）；《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在澳門的日本人》（1974）；《東帝汶傳教團》（1974）；《在澳門教區的卡諾薩人一百年紀念：1874-1974》（1974）；《在摩爾人兵營生活100年》（1974）；《澳門杰出婦女陳列館》（1974）；《喬治·奇內里誕辰二百周年：1774-1974》（1974）；《澳門最大的一次颱風：1874年9月22-23日》，《澳門教友會》（1975）；《若昂·弗雷拉·德阿爾梅達：把聖經譯成葡語的翻譯家》（1975）；《澳門的醫療護理》（1975）；《澳門的醫生》（1975）；《澳門的疾病分類》（1975）；《澳門的軍人》（1975）；《二十世紀澳門的醫生》（1976）；《澳門的奴隸貿易》（1976）；《1857年的澳門》（1976）；《澳門的特別法官》（1976）；《澳門的聖若澤神學院：歷史的總結》（1976）；《聖母受難會》（1976）；《澳門教育促進會一百周年：1871-1971年》（1976）；《主教、傳教士、教會和學校》（1976）；《中國傳教會》（1977）；《在越南的葡萄牙傳教團》（1977）；《澳門與越南的貿易往來》（1977）；《在澳門的卡蒙斯岩洞》（1977）；《跨過若干世紀的澳門》（1977）；《1910年在路環的海盜》（1977）；

《在路環的貴重財富：日本和越南殉難者的遺物》（1977）；《峰景旅館》（1978）；《在澳門的方濟各會修士》（1978）；《朝鮮傳教會》（1979）；《中國木廟：馬祖廟》（1979）；《同類名字的街道》（1979）；《澳門的聖保羅教堂》（1979）；《澳門的特別法官》（1980）；《馬祖廟的歷史》（1979）；《澳門石碑之聲》（1980）；《在澳門的總督府》（1980）；《卡蒙斯在澳門》（1980）；《卡蒙斯曾到過澳門》（1981）；《十六世紀的澳門》（1981）；《十七世紀的澳門》（1981）；《一位美國女青年眼中的十九世紀的澳門》（1981）；《台北和路環》（1981）；《戰爭期間的澳門》（1981）；《在朝鮮》（1981）；《澳門軍人俱樂部》（1982）；《澳門的教育》（1982）；《十七世紀的澳門》（1982）；《澳門的塔》（1982）；《澳門著名的雕塑》（1982）；《葡萄牙在緬甸》（1983）；《葡萄牙在柬埔寨》（1983）；《葡萄牙在泰國》（1983）；《澳門的新教徒之墓》（1984）；《十八世紀的澳門》（1984）；《葡萄牙在新加坡》（1985）；《澳門中學》（1986）；《澳門的起源》（1990）；《在廣東的教堂》（1997）。

上述書目沒有完全收錄曼努埃爾·特謝拉發表在雜誌上的許多論文和與人合著並見諸於葡萄牙和外國報刊上的作品（他筆耕不輟，一直為澳門報刊，特別是《澳門報》和《今日澳門報》撰稿）。對他的作品書目的研究離準確地涵蓋其全部作品還相距甚遠。

